

潍坊政协文史丛书

清代大收藏家

陳介祺

邓华◎主编

文物出版社

潍坊政协文史丛书

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

邓 华 主编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设计 / 张希广

责任印制 / 张道奇

责任编辑 / 贾东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/邓华主编. —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
2005.2

ISBN 7-5010-1729-8

I. 清… II. 邓… III. 陈介祺 (1813~1884) —
人物研究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7304 号

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

邓 华 主编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)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安泰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印张: 5.75

2005 年 2 月第一版 200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0-1729-8/K·905 定价: 22.00 元

《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》编委会

主 任：迟昭厚

副主任：鞠法昌 赵 俭 王庆德 王金卓 郑汝智
姜绍华 张明海 邓 华

委 员：刘玉明 陈 俊 任立先 李臣涛 孙 军
张玉雪

主 编：邓 华

序

陈 炳 熙

大凡一个地方出了一位在某方面可以冠冕全国的人物，这位人物便会成为当地的自豪与骄傲。然而这类人物不是各地皆有，其所以成为骄傲的原因也在于此。陈介祺是清朝金石学领域的冠冕，因而便是潍城的自豪与骄傲。

陈介祺作为金石学的冠冕，主要是因为他收藏了毛公鼎等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文物，并且编印了内容宏富的古印谱——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。

毛公鼎是现存古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。这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，铭文多达 497 字，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奖其臣下毛公盾之事，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此鼎自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不久，就被陈介祺收藏，并制为拓片，释其铭文。此外他的重要收藏还有大丰簋、兮甲盘、曾伯霁簋、迟簋和“十钟”。簋和簠都是古代祭祀宴享时用来盛稻黍的铜器，“十钟”是十一口商周青铜钟的概称。这些铜器，他也都做出拓片并写有跋文。

他的另一重要收藏是“万印”。《十钟山房印举》即由他将“万印”汇编而成。先于同治十年（1871 年），将所藏古玺印及汇集的吴云、吴式芬、吴大澂、李佐贤、鲍康等所藏的古玺印，钤拓成十部，每部五十册，是为初稿。又于光绪九年（1883 年）

重新增编，每部达 194 册。因采用举类分列的体例编排各种印式，故名“印举”。所收为三代古玺、秦、汉、晋官印及私印，尤其名贵的有赵飞燕玉印、琅玕相银印、汉十二字金印等。其中，“赵飞燕玉印”为万印中名贵之首，原为龚自珍所藏。此印为鸟篆体，自右至左，为“婕妤妾娟”四字，龚自珍释为“婕妤妾赵”。其实“娟”不是“赵”，四字意为一个名字叫“娟”的女官（婕妤）之印。此一女官，汉武帝时始有，“位视上卿，秩比列侯”，虽不是赵飞燕，但亦非寻常之辈，流传至今，实属珍稀。

陈介祺贵为协办大学士之子，本身又是翰林院编修，照例来说，应该在仕途上谋求腾达。但他目睹父亲在宦海中的风险，又身经被逼迫捐纳巨额军饷的灾难，乃有意学古人作“遂初”之赋，趁咸丰四年（1854 年）母丧丁忧的机会乞假归里，专力去做他金石学的研究。他本有书法天赋，又受好友何绍基的影响，创出了自成一体的书法，在这方面他本应更享盛誉，但被他金石学家的大名所掩。他也有文学方面的禀赋，有一副楹联写道：

曾种桃花不知汉魏
犹存松菊自谓羲皇

上句以《桃花源记》中“不知汉魏”的隐遁的秦人自比，下句复以陶渊明《与子俨等疏》中的“常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”的语意，自喻无为、无求、无争如太古之人的心态。他为母亲逝世写的《哀启》，是一篇感人的好散文，可惜已散失无传（本人收存的一份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）。他的著作也有散失无传者，每见论者提到他的《传古别录》之类，但几乎未见有提到他的《考古小启》（此册亦失于“文

革”)者，是否也已经失传，不可知矣。

在潍坊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，邓华先生近年竭尽收罗，将尚存世的有关陈介祺这位金石大家的资料及研究者写的文字，尽可能收集齐全，编为一册。这无疑对弘扬家乡文化，拓展研究之路，是一个不小的贡献。同时也为海内外陈介祺的关注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，而且那些散失的资料也许因为此书的问世而重新得以发现，则不仅邓华先生一人要喜出望外了。

2004年8月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陈炳熙(1)
清代大收藏鉴赏家陈介祺·····	陈小波(1)
北京琉璃厂古玩商谈陈介祺·····	陈重远(6)
陈介祺纪事·····	邓 华(11)
陈介祺藏品轶事·····	邓 华(16)
人类文明起源于文字·····	陈继揆(21)
《簠斋论陶》序 ·····	陈继揆(23)
一位超前的古文字史探索者·····	邓 华(27)
万印楼·····	刘秉信(34)
万印楼藏印始末·····	陈君善(39)
国宝重器毛公鼎·····	邓 华(46)
毛公鼎旧事·····	陈继揆(51)
毛公鼎传流民间九十五年·····	陈重远(61)
陈介祺的书法艺术·····	陈时超 陈景蕃(69)
陈介祺与传拓工艺·····	邓 华(75)
晚清传拓技艺的开拓者——记陈介祺与潍城的传拓 艺术·····	陈时超(79)

王懿荣与陈介祺·····	吕伟达(88)
陈介祺的义子曹鸿勋·····	杜在祯(93)
簠斋公自撰手书楹联·····	陈秉忱 辑注(108)
山东省潍坊市潍城陈大观家族世系简表·····	(110)
潍城《清代科甲出身名录》中的陈氏家族成员 ·····	邓 华 整理(115)
潍城陈氏世家简史·····	邓 华(119)
陈介祺世家的重要历史人物·····	邓 华(127)
陈介祺家有关传说及文物补遗·····	张德民(134)
图 版 ·····	(137)
后 记	

清代大收藏鉴赏家陈介祺

陈小波

陈介祺（1813～1884年）字寿卿，号簠斋，山东潍县（今潍坊市潍城区）人。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进士，历任工部、兵部、礼部、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等重要官职。他青年时期跟随其父在京一起生活。自幼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。十九岁即“以诗文名都下”，乡试时考官阅卷疑陈介祺为耆宿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考中举人，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又考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等职。居官近十年，涉猎了各种文化典籍，对经史、义理、训诂、辞章、音韵等无不钻研，对金石更有特殊爱好。

他供职清廷时，中国经历鸦片战争，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，深感国事日非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母亲在家病故，他借母丧归里，下决心不再外出为官。并作诗曰：“热闹场中良友少，巧机关内祸根蟠。”从此以后，陈介祺即潜心于金石及其他古文物的收藏和研究。他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，得到阮元的赞赏，并与何绍基、吴式芬等名家交往甚密。他收藏金石，重在研究古器物、古文字，探索古文化。经过多年努力，他对金石文字的收藏考释作出了卓越成绩，得到专家学者的赞仰。

要介绍这位金石学家，还得从他的“万印楼”开始。在他收藏的金石器物及其他文物中，仅三代及秦汉古印玺一项就近万

方，收藏之富为全国之冠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他在家乡修建了“万印楼”，以珍藏来之不易的印玺和一万多件其他文物珍品。从此“万印楼”名声大振。《清史稿》称赞他的收藏是“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”，被誉为“一代金石大师”。

他对大量古玺和封泥反复进行鉴别整理，首先编写了一部《簠斋印集》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他用自己所藏古玺并汇集吴云、吴式芬、吴大澂、李佐贤、鲍康等收藏，钤拓印集10部，每部50册，定名为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。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又重新增编10部，每部191册，集印一万多方。之所以定名为《十钟山房印举》，一是陈介祺在他收藏的11件商周古钟中，取其整数，把他的书斋称为“十钟山房”；二是在整理古玺印钤印拓时采取了举类分列各种印式的办法。这部《印举》最早由上海商务印书馆“涵芬楼”影印出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在上海再版，西安见到的有12册的原“涵芬楼”版，有上海书画出版社从万印中精选2000方并增补了释文的选本《十钟山房印举选》。

陈介祺还对其收集的大量“封泥”（也称泥封），作了深入研究。

中国古代的往来公私简牍，大都写在竹简上。为防止别人私拆，封发时把竹简用绳索捆紧，把绳子结交处再用黏土封严，盖上发信人印章，作为信验。这种“封泥”多流行于秦汉。陈介祺共收集了800多枚秦汉公私“封泥”，加以考释，与吴式芬共同编写了共10卷的《封泥考略》，对研究秦汉官制、地理等都有参考价值。它是我国最早研究“封泥”的一部专著。《封泥考略》一书1990年已由中国书店影印再版。

在陈介祺珍藏的文物中，最著名的是青铜器，其中以“毛公鼎”为最。“毛公鼎”是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完好

无损的稀世珍品，系西周宣王元年由宣王的叔父毛公盾所铸造，又名“盾鼎”或“毛公盾鼎”。鼎有铭文 30 行，连重文共 497 字，为传世最长的铭文。“毛公鼎”最早由陈介祺收藏，清末转手两江总督端方。后来几经转手，英国人和日本人费尽心机多方搜寻未果，后由叶恭绰巨金收购，加以保护。日寇侵华，1938 年上海沦陷，叶恭绰出走香港，将所藏古文物和毛公鼎一同留沪秘藏。后被日本宪兵得到消息，追查甚紧。叶恭绰在港听到消息，急电其侄叶公超（时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，后曾任台湾“外交部长”、“驻美大使”），要他不惜任何代价保住“毛公鼎”。叶公超刚到上海即被日本宪兵逮捕，后由家人假造一古铜器缴出了事。但叶公超仍被监视。直到 1941 年夏，叶公超才巧妙地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，将此国宝带往香港交其叔父。1941 年 12 月香港陷落，叶恭绰被日寇软禁、监视，再回上海，生活困难，“毛公鼎”又被一巨商以 300 两黄金购去。购前曾秘密协定，抗战胜利后，必须捐献国家。所以抗战胜利后这件国宝没有流失国外，由南京中央博物院收藏。后运往台湾，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“毛公鼎”在陈介祺手中时，经过悉心研究，撰写了《毛公鼎考释》。这一研究成果，对研究我国西周史、冶金史和古文字均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到了晚年，陈介祺更是不避辛劳，仍尽力古文物的钻研，考释名家所藏金文。他是古陶文字最早的发现者、收藏者和有贡献的研究者，有开创之功。对古玺印和古陶器之收集考释，不遗余力。“陶文齐鲁四千种，印篆周秦一万方”就是这时撰写的，并有题记曰：“余归来不能致古鼎钟，今老矣，忽于齐鲁得三代文古陶数十器，暨陶文四千种。旧藏秦汉印七千纽，尚可增益，尤肆力于三代古玺印，皆前人所未及也。”记录了他当时工作的情

况和心情。

陈介祺一生收藏的古代文物，类多、量大、面广，尤重珍品。其藏品中有铭文的就有商周铜器 248 件，秦汉铜器 98 件，石刻 119 件，砖 326 件，瓦当 923 件，铜镜 200 件，玺印 7000 余方，封泥 548 方，陶文 5000 片，钱币、镜、铍各式范 1000 件。其他如铜造像之类尚未计算在内。他一生治学严谨，重视研究方法，主张一器一物都应多加分析，察其渊源，辨其真伪，反对不求甚解。因此他对古文字学的贡献是很大的。现存他的考证释文有《毛公鼎释文》、《南公孟鼎释文》、《虢季子白盘考释》、《聃簋释说》、《区谖考记》、《器侯驭方鼎考释》、《郃钟考释》、《齐侯铎考释》、《龙姑簋考释》、《铸子器考释》、《簠斋金文考》、《金文题识》、《藏古册目并题记》、《集古金文考释》、《汉铎考记》、《印举考释》、《陶文考释》、《簠斋藏秦权量铜诏版释文诗记》、《十钟山房印举》，还有《传古别录》、《访碑拓碑笔记》、《印举事记》以及与吴式芬、翁大年合编的《封泥考略》等。

后人所辑的《陈簠斋尺牍》也很有特色，保留了很多有关学术资料。在收藏研究过程中，他经常与各地收藏家通信联系，或对古文字探讨研究，或对金石考证，或对器物出土流传及著录切磋探讨，不厌其详。往来书函无虚日，动辄三四千言，友人得其书简，无不珍藏，或加以装裱成册作为研究资料。西安文物收藏家阎秉初老先生藏有陈介祺的两封信，装裱整齐，完整无损。其中一信是写给西安苏济时的，共 12 页约 1600 字，信中谈到“秦权”、“虎符”等，说“秦权”之式“与刘燕翁所得大者同，此小而略厚……刘器皆二世时物，唯大者有二十六年诏在左，所谓故刻左使无疑也。”信还说：“相交四十年，不必剖白，只以足下鉴别不及令兄，恐有人为所误处，不能不相告。”由此一信，即可

看到陈介祺治学的严肃认真、待人以诚的作风和品德。真是读此信如见其人。

陈介祺也擅书法，喜书钟鼎，字写得凝重大方，别具一格，人称“金石书体”。我的居室内有一对联即陈介祺所写：“踽凉齐饿者，俎豆古逸民”，系刻石拓片。其中有一段陈介祺的逸闻：陈介祺之妻病故，要在死者棺盖上刻几个字，同邑韩秀岐（字息舟），家贫，有学识，有德性，是一位篆刻家，刻字事非他莫属。经过几次恳请，韩秀岐才答应下来，据说韩的手为此都磨出了血。陈介祺提出答谢，都被韩谢绝。最后陈介祺才写了这副对联答谢他，赞誉韩是一位品德高洁受到人们尊敬的人。陈介祺在这一对联的上款写有“息舟有独行，为余刻石，撰此酬之”。人们都说这一对联是陈介祺书法作品，并说“这字不次于何绍基”。

陈介祺卒于1884年，终年72岁。享誉海内外的“万印楼”已由山东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陈介祺故居陈列馆也在陈介祺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馆。

北京琉璃厂古玩商谈陈介祺

陈重远

编者按：北京著名作家、中国文物古玩史专家陈重远先生是《文物话春秋》、《古玩谈旧闻》、《古董说奇珍》、《鉴赏述往事》、《收藏讲史话》、《古玩与珠宝》等琉璃厂古玩珠宝行系列书的作者。他年轻时曾在琉璃厂古玩店工作，离休后又专门采访琉璃厂的古玩老艺人。在他近十部著作中，真实地记载了北京琉璃厂古玩珠宝行的旧事轶闻，其中有不少对陈介祺的记叙和评论。下面，编者从《古董说奇珍》中摘出一段精彩对话，以便读者了解古玩收藏界对陈介祺的传说与评价。

琉璃厂老古玩商丁兆凯说：“李大爷，您的记性好，多年前的老事儿，您都说得一清二楚。德宝斋鉴定毛公鼎的事儿，前些日子您答应给我们说说，今儿个我们要听您的了。

李德祥说：不要光听我的，咱们一块儿聊。我听说毛公鼎是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，咸丰二年由陕西旅客苏某兄弟二人运来北京，经德宝斋刘振卿和博古斋祝锡之过目，介绍卖给道光进士，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翰林院编修陈介祺。陈介祺将毛公鼎运到他的老家山东潍县收藏。

丁兆凯说：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掌柜说过，那两位陕西老客（清代时北京古董商分为坐商和客商，客商是外地来京做古玩生意的，北京同行称他们老客）听说叫苏亿年、苏万年，

他们哥儿俩后来在仿铸、仿刻铭文上开了头，铜器上的后刻铭文后来可不少，不单是他俩的手艺，之后又有多位艺人。我们掌柜的虽不识鼎彝文字，可一眼就能看出是后刻或仿铸。

杨兴顺说：甬说岳二爷，就是您丁大哥，铜器上后做假锈和后刻的字，不也是一眼看透，再怎么作假也逃不过您的眼睛。

丁兆凯说：兴顺！您甬夸我，咱们还是听李大爷往下讲。

李德祥说：我只说个大略。我是吃瓦器的，这铜器吃得不透，细说就说不清楚，只说个大概其吧！要说这毛公鼎，是个头不小，一人搂不过来，搬也搬不动。

丁兆凯说：我听叶三儿跟我们掌柜的说，那鼎的口径约有一尺五（50厘米左右），肚大腹围约有四尺四寸（145厘米）不到，高不到一尺六（53.8厘米），重有七十来市斤。形状是大口、深腹、圆底、半球状，三个兽蹄足，口沿上竖立两个高大的耳子。口沿下腹上部有一周环纹带，其他部位没花纹，腹内铸有32行、499个字的铭文。

李德祥说：出土的铜器中就属这鼎上的字多。咸丰年间研究金石文字是陈介祺最有名，他搜集的汉印也最多，是德宝斋的老主顾。那时朝野文人学士喜爱秦砖汉瓦，秦汉印章，它们东西不大，却体现着中国的文化。瓦当、圻砖上有图案、有文字，秦汉印章上有鸟篆籀、金文小篆，镌刻讲究。有人说印章虽小，可与鼎彝碑版同珍，就是指章上刻的字。

杨兴顺说：要说印章是田黄、鸡血石的值钱，秦汉铸的铜印现在不多见了，搜集的人也少。

丁兆凯问道：李大爷，您说这印章什么年代的最早？

李德祥答：传说西周时代就有了官印，“周印最早”，可谁也没见过；“秦玺最宝”，更是瞧不见了。说周天子分封诸侯时给铸

铜印，做官要有印是从那时传下来的。秦始皇当了皇上，把印玺看得至高无上，取蓝田之玉，命李斯书文，孙寿镌刻，制作了传国玺，乃传世国宝，得天下者一定要争夺到这颗传国玺！

杨兴顺说：印章的名儿太多，说不清楚，皇上的印章叫玺，我们柜上用的印章叫水印，我自己用的印章叫手戳。

李德祥：这叫因人而异，其实是一个东西，当然大小不同、质地不同、镌刻不同。皇上的就叫玺，王爷的叫宝，当官的叫印，你我的就叫手戳了。据说朝代不同，叫法也不同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通称玺，始皇分制后皇帝之印称玺，其余的都叫印。汉代则诸侯王称玺，将军称章，其余均称印。明清以来才有什么水印、手戳的叫法。还有图章、图书、铃记、铃印、记、戳记、戳子等叫法。

丁兆凯说：我听袁翰林跟我们掌柜的讲，印章的制度是始于秦，盛行于汉，秦汉印章有价值，铜的多玉的少。

李德祥说：兆凯说的贴谱，袁翰林有研究，他也收藏古玉和印章，可与陈介祺比起来就是九牛一毛了。陈介祺收藏汉印数量多，号称万印，盖有万印楼。后人说他约有印章六千颗以上。印章这么多，镌刻的文字就多，字体也多。有人说，陈介祺囊括汉代名家之金石镌刻，汉代的各种字体，均可在其收藏印章中见到。其文字式样之齐全，书法之精美，刊镌之不失原形，传世之未损存真迹，乃绝无仅有的一部法帖、铜器铭文无法相比之汉代书法镌刻大全。

丁兆凯说：袁翰林还说过，西汉时代我国书写大多用布帛，在布帛写字便于在上面盖上印章，印章盛行跟在布帛上书写有关系。收藏家都赞美汉印古朴典雅，故言印必称汉。陈介祺收藏汉印，可说是“空前绝后”了。他去世后，清末民初，万印楼中的